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 创新发展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刘昌明 孙通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源自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理念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具有更强的国际复合视野、进程导向和责任意识。面对当前中国外交思想研究学理化不足等困境,国内学界应当遵循人文社科理论研究的一般性路径,从问题化、方法化、概念化、体系化四个维度递进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学理化;话语体系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9.01.00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①。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在当代国家间交往方式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对当代世界的新认识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成果。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内涵、理论与实践价值、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总的来看,相关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内涵、渊源等方面的政策性阐释,缺少深度的学理分析和研究^②。同时,受国际关系研究中西方话语主导的影响,部分成果在对中国特色外交思想

作者简介:刘昌明,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孙通,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7RWZD18)。

① 栾建章:《深入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五个维度》,载《光明日报》,2018年8月15日。

②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理念内涵、理论与实践价值、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构建方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张清敏、田田叶:《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中的文化因素》,载《国际论坛》2016年第2期;邢丽菊:《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左凤荣:《习近平外交新理念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6期;金应忠:《从“和文化”到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周敏凯:《加强国际关系领域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话语权的理论思考》,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6期,等等。

和实践的学理化分析时往往又局限于西方传统的研究范式，欠缺创设和运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理论自觉和自信^①。因此，如何提升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学理化程度并推动其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学术界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和当务之急。本文拟在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及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对构建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及逻辑路径等进行探索和尝试。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

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在外交战略、政策制定中的指导地位，并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内容概括为10个“坚持”：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②。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把握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

（一）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根本方法和重要理论依据。首先，习近平外交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深刻分析和洞察“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逻辑路径、驱动力量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其次，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原则，将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视为一种具有主体间性和能动性的实践导向活动，超越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国强必霸和对抗的现实主义理论分析窠臼，强调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进程中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出了超越大国崛起困境的新型国家间交往模式和理念^③。再次，习近平外交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对立统一的辩证角度探究国际体系秩序失序、全球治理体系失灵、文明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倡导从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统一性角度出发，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意识，构建更具包容性、普适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体系。最后，习近平外交思想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之间应该奉行道德与正义准则的共处之道，国家间应在保证民族独立、主权平等基础上进行平等合作等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① 参见韩德学：《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1期；周敏凯：《加强国际关系领域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话语权的理论思考》，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6期。

^② 人民网：《习近平系统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625/c1002-30082065.html>。

^③ 栾建章：《深入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五个维度》，载《光明日报》2018年8月15日。

（二）“和合”文化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文化渊源

文化一直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会对一国的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直接影响^①。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兼爱非攻、亲仁善邻的和平志向，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以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情怀。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价值观，滋养着中国外交理念的根脉，孕育着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核是倡导构建一种与“和合”文化相契合的国家间相处模式和国际秩序理念，因而蕴含着深厚的“和合”文化内涵。

首先，习近平外交思想中“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的理念源自对“和合”文化、“和谐共生”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群体本位和关系本位特征。“协和万邦”在古代被用来形容“协调亲和各诸侯国，使各诸侯亲如一家、和谐相处”。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中国政府创造性地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国际交往之中，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遵循的基本原则。此外，“礼之用，和为贵”、“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等传统文化理念亦与新时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高度契合，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文化来源，亦是对中国“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的群体、关系本位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引领和实践基础。这一理念亦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和“天下为公”的责任担当意识。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兼济天下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中国政府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间交往模式、“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均强调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兼顾与平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责任导向“义利合一”“天下为公”价值观的继承与弘扬，并为之注入了时代内涵。不仅如此，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从阴阳五行到天地人三才之道，任何事物都是彼此关联的利益共同体^③，这就需要个体之间通过包容合作达致和谐共生的“致中和”状态。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家间“合作共赢”相处模式理念的强调，不仅蕴含了“和合”文化中“兼济天下”“天下为公”“睦仁善邻”的共生、共享、共处之道，亦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中“注重整体上和谐相处、淡化个体间分歧矛盾”的群体本位价值特征^④。

再次，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共生”文化观应用于外交理念和实践的时代创新产物，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国“和”文化倡导一种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国与国之间和谐共生，互不相害的价值理念和处事原则，讲求在一定原则规范指引下协调、化解矛盾，追求“求同存异”的和谐共生境界。与之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所倡导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五维内涵和相关话语表述^⑤，恰恰与“和合”文化中“以和为贵”“和

① 孙吉胜：《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

② 人民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外交开辟新境界》，<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19/c40531-29714966.html>。

③ 邢丽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载《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6期。

④ 孙通、刘昌明：《国际秩序观塑构中的文化特质——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载《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2期。

⑤ 新华网：《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19/c_1120340081.htm。

谐共生”价值观的精髓相契合，是中国文化特质影响中国特色世界秩序话语构建的直观表现。

（三）新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经验借鉴和实践来源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继承和借鉴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就外交理念的继承性而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到遵循《联合国宪章》要求，维护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理念，再到十八大后中国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倡议等，这一切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念基础，保持了中国对外政策、理念及其执行上一以贯之的连续性、稳定性。

就外交实践的延续性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借鉴和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中，无论国际形势变化如何波谲云诡，中国在外交政策和实践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的同时，亦为世界和平和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从十八大前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和进行国际援助、创设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东盟（10+3）合作机制，再到十八大后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并推动实施“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建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所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不仅源自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累积外交实践经验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更有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理论创新，是全面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实践经验的理论成果。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七十年的外交历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中所凝练的外交理念，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形成的外交传统、价值理念、责任担当、大国胸怀等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和经验来源。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政策和实践渊源，既源自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又源自大国外交的创新实践”^①。

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外交新思想相结合的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代脉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新时代外交实践的创新成果，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典范^②。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是在系统总结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外工作实践经验和优秀理论成果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亦是对过去 300 多年来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体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位上。在纵向上，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建国后中国历届领导集体外交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在横向上，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 and 理论观点上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① 人民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外交开辟新境界》，<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19/c40531-29714966.html>。

^② 人民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613/c40531-30054117.html>。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建国以来中国外交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系统总结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外工作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其中包括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届领导集体外交思想精髓的吸收和继承，同时又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发展与创新赋予自身更多的时代内涵。

首先，基于对角色定位和“世界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实践路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一系列契合时代特征和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外交新思想、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正前所未有的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的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①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下，新时期中国角色定位正经历由“发展中大国”向“发展中强国”、由“国际体系边缘角色”向“国际体系塑造者”、由“地区性强国”向具有“全球性影响大国”的转变。与之呼应，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亦经历了从融入国际体系、侧重自身发展的“韬光养晦”战略思想到塑造国际体系，兼顾共同发展的“奋发有为”战略思维的转变过程。在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一系列具有“角色意识”“历史自觉”“国际视野”“世界关怀”“时代特征”的创新性外交理念和思想，并以此为指引积极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和重塑，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外交更加主动进取、积极有为的转型特征。

其次，与建国后历届政府的外交思想相比，习近平外交思想更强调过程和实践导向，更聚焦于中国外交理念、构想的路径探索和方案措施^②。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就“如何构建这一世界”即“如何构建新型国家关系”提出了具体路径和方案，使目标具体化、措施化，实现路径更清晰。具体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生态五个维度进一步丰富了建国以来中国外交思想的内涵，更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对外交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应用型理念和实践路径。在政治领域，在十七大报告关于“构建和谐国家间关系”表述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通过“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大国间良性互动的新型国际关系，依据“亲诚惠容”方针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通过践行正确的“义利观”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理念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外交新思想和新路径。在经济领域，在十七大报告关于“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表述的基础上^③，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提出“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新发展观，“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④，为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治理改革创设了更加具体的理念和路径。在安全领域，较之江泽民提出的

^① 苏格：《中国外交的伟大历史征程》，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5期。

^② 新华网：《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17/c_1120486809.htm。

^③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

^④ 人民网：《习近平主席将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阐述新发展观》，<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16/c1002-27594683.html>。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①，习近平将安全观进一步具体化、可操作化，强调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普遍安全格局^②。在文化和生态领域，习近平将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进一步升华，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和实践路径^③。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

长久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在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成长与发展，亦始于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但同时，囿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容多带有较强的西方价值观和自身利益偏好，其理论构建的实质和目的主要是为霸权护持、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服务，因而在解释国际问题时带有西方国家的价值偏好和理论局限^④。当前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更为鲜明的国际关系事实，倚靠西方经验支撑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日益凸显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引发了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非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并由此产生了对更具普适性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念的强烈需求。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既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因素，又融入了中国特色的东方智慧，表现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

首先，相较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偏重结构理论而忽视进程变量的特点，以“合作共赢、和谐共生”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及根基于中国的理论学派更呈现出动态化的过程导向特征，更强调实践进程的建构作用，赋予合作进程以主体地位，认为合作进程和共赢结果可以产生社会性力量，从而通过良性互动塑造国家间的联系与认同^⑤。较之西方国际关系的结构选择观点，中国“过程导向”的外交思想与“和合”文化中的整体性原则及弱冲突逻辑有助于各国求同存异，从共有利益出发弥合分歧、化解矛盾，因而更符合现阶段国际社会权力多极化、全球治理多边化、文化多元化的现实需求。

其次，习近平外交思想虽承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的表述，但反对西方学说中主权应让位于人权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35—536 页。

^② 王帆、凌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2 页。

^③ 新华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④ 吉尔平、克萊斯納等现实主义学者主要从把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国际规则与霸权护持角度为美国霸权合法性提供学理性支撑。参见：[美] 罗伯特·吉尔：《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Stephen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等自由主义学者主要从国家制度、软实力和霸权护持之间关系的视角进行研究。甚至连温特的建构主义的思想都被认为是美国式的自由建构主义，表现的是一种自由派的意识形态。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温特提出的康德文化的根本在于以霸权体系价值观念为核心重新整合世界的观念结构，以便在这种基础之上建立普世性集体认同。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3, 2003, pp 325-342; Samuel J.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2, 2004, pp 348-352.

^⑤ 王帆、凌胜利主编：《中国角色、中国方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 页。

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①。中国外交思想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强调和对主权概念的完善不仅丰富了国家主权理论的内容,亦驳斥了西方主权弱化论、过时论、终结论的片面观点。

再次,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均倡导构建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②。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世界多极化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西方多极均势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中国反对西方权力政治视角下由大国独霸或大国协调维持国际秩序的霸权稳定理论和均势理论观点,而是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都具有平等参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机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③。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多极化全球治理观点是对西方体系稳定理论的扬弃和超越。

习近平外交思想进一步深化了人类社会对于纷繁复杂国际关系现实的认知,增强了学界驾驭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能力,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上均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升华。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话语作为特定语境中使用的语言,兼具交流性和价值性特征^④。顾名思义,外交话语和学术话语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一国在外交战略政策或学术研究所持有的特定思维方式和所使用、产生的各种语言表述^⑤。外交话语不仅要强调政治性、还要重视学术性^⑥。一般而言,学理性强的外交话语更具内在逻辑关联和对外感召力,在国内外拥有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因而外交领域的学术话语构建不仅有助于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而且通过学术话语体系平台将有利于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鉴于此,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亟待构建相应的学术话语体系,以推动学术界从政策阐释向学理化研究转化,进而为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构建学术话语体系是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需要

外交理念的国际传播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依托,还有赖于与之配套的学术话语体系支撑。二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及其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西方国家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正如郑永年教授所指出的,

① 人民网:《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25/c40531-20902911-2.html>。

② 转引自章前明:《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③ 人民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119/c416882-29775965.html>。

④ 金正昆:《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9年版,第114页。

⑤ Ken Hyland, “Academic discourse,” In Hyland, K. & Partridge, B. (eds.) *Continuum Compan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2011, pp. 171-184; 金正昆:《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⑥ 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

“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在于重建知识体系”^①，在向世界传播和倡导中国新理念、新思想并获取国际社会认同之际，亟待构建相应的学术话语体系来为这些理念和思想提供学理支撑。在外交领域，为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研究及其国际传播，也需要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与学术话语构建相结合，构建一种具有自身文化特质且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学术话语体系。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外交学术话语体系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界对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照搬西方理论、缺少学术自信、理论创新不足等问题。具体而言，虽然十八大以来中国学界对新时期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展开了全面、深入分析和探讨，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有些研究成果仍拘泥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而忽略中国自身的文化基础和价值取向。不可否认，西方学术话语和研究范式固然可以为中国学术界提供某些独特研究视角和思路，但也往往导致了在国际问题的研究中出现“西方化”的倾向。一些学者甚至抛弃哲学社会科学所特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盲目照搬西方学术概念，套用西方理论范式和学术话语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实践，甚至致使个别学者陷入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惯性思维窠臼，并对西方理论产生“学术依附”，丢失本土学术研究的自信和能力，最终陷入西方国家议题设置和分析框架中无法自拔。久而久之，导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陷入一种“看着苹果（依赖西方分析框架和学术话语）来描述橘子（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的怪圈^②。由此可见，中国外交思想研究——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话语“西方化”倾向成为阻碍中国学界进行学术话语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外交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全面融入国际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已成为提升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客观需要^③，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和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指示^④。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和打造中国外交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学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中国外交问题时已经开始尝试去“西方化”，通过构建“清华路径”、“国际共生论”、“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社会进化论”等“中国学派”，提升中国外交学术话语建构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自信^⑤。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路径

近年来，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渐成为学

① 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3页。

② 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③ 人民网：《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1031/c40531-30374249.html>。

④ 人民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2.html>。

⑤ 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成果可参见：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课题组：《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Tang Shipi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1, 2010.

术界研讨热点^①，中国外交思想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亦成为当前国关学界探讨的重要议题。当然，构建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绝非轻而易举，需要面对诸多复杂难题和挑战，这首先需要学者们在立足中国实际基础上，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进一步“概念化”“问题化”“方法化”“系统化”，进而提升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系统化水平和学理化程度。

1. 要明确构建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条件和要素。

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构建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和要素。第一，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需要特定学科丰富的人才储备、经费和政策支持，没有相应的研究人员、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任何国家都难以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学术话语体系。第二，对某一问题研究的学术原创能力和学理化水平是否满足概念、理论、范式创新的需要。换言之，中国学界能否在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中推陈出新，将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和思维转化为学理化的分析范式，赋予其学理化内涵是其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第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过程中所创设的新概念、新方法、新范式能否被国外学界所理解、认可和沿用。也就是说，中国外交思想的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具有逻辑自洽和理论说服力，避免出现仅被中国学界认同的相对封闭的学术话语体系。如果把构建学术话语体系所需条件做个排序的话，笔者认为，人才储备、资金、技术、政策支持等国家实力要素是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物质基础，处于金字塔的底部。在此基础上，学者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概念、理论、范式创新能力作为中间环节，决定着能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最后，这一学术话语体系能否被国外学界所认同，则最终决定着中国能否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2. 探索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演进路径。

构建中国特色外交学术话语体系是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现实需要，需要中国学者遵循人文社科研究的一般规律，从“问题化——方法化——概念化——系统化”逻辑演化路径，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术话语体系。

第一，要增强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的源自问题^②。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术研究首先要有问题意识，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是进行外交理论创新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③。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理化研究也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在外交思想倡导和政策实践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一方面，学者需要培养提出理论核心问题（理论的“硬核”）的意识和能力。中国新时代的外交新理念、新思想及其政策实践过程必然存在着诸多值得研究的现象和问题，但我们需要从中寻找核心理论问题加以研究，并在这一问题框架内设置出具体的研究议程。另一方面，学者需要在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过程中发现具体问题。在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中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理念和主张时，我们

^① 人民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②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③ 人民网：《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728/c40531-28590893.html>。

应该透过理念本身，从学理角度寻找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倡导过程中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中国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相较于西方理念有哪些优势和不足？在倡导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又如，为什么中国外交思想中总是强调共同利益的群体本位，这能否对西方强调个体、重视差异的国际秩序理念体系进行补充和重塑？这些兼具学理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问题均存在于中国外交理念倡导和实践的进程之中，需要学界同仁提出和回答。

第二，创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方法。在提出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问题后，我们需要选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之进行探讨，也就是解决“怎么研究”的问题。在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学者能否找到和创新科学研究方法，将直接影响着学术研究过程中核心概念的提炼、分析路径及理论创新。面对当前西方学术话语垄断和本土方法论自觉意识不足的现状，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术研究既要吸收西方既有方法论中的合理成分，又要积极创新具有中国特色、能够更好解释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的研究方法。例如，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仅是理想主义层面的价值理念，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面临具体议题时的指导原则。这就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既要遵循理性主义、行为主义等客观本体属性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又要借鉴理念主义等主观本体属性的解释学方法论^①，通过融通中西方研究方法拓宽解释问题的视角，提升思想的解释力。此外，在对具体问题研究时亦需要在研究手段、工具和分析路径上进行创新，将中国理念与“提出理论假设和检验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创设出解释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模式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第三，创设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解释，而理论用来解释的工具就是它的核心概念^②。能否创造出源于中国实际但又具有普适性、共识性的核心概念，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英国学派就是凭借“国际社会”这一标志性概念而在国际关系学术话语体系中占据重要席位；哥本哈根学派则通过“安全化”理论而声名鹊起^③。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中国学者需要通过精准的概念、科学的范畴和严谨的逻辑，科学地表达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且体现学界共识的核心概念。事实上，成长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派已经尝试提出诸如“关系理论”“国际共生”“国际政治社会进化”等核心概念，在问题研究的“概念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同时，如何使核心概念在具有中国自身特性的同时，又能与西方学术话语对接，进而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共同知识”，仍是中国学术话语“概念化”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这需要在发掘创造中国特色国际关系概念时遵循学理概念创造的基本原则，既强调源自本土化经验和文化的特质性，又重视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以便让中国学界创设的核心概念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适用性和认同度。

第四，加强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学术体系化建设。在经历“问题化”“方法化”“概念化”三个阶段后，学者已就特定议题或问题创设出了核心概念和解释路径，但仅凭此仍无法建立宏观、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范式。我们仍需要将核心概念、解释路径进行系统性、结构性的整合，才能形成由概念、原理组合而成的知识体系和系统性研究范式。就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体系化而论，现有中国学派虽然形成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质的解释路径和理论框

^① 秦亚青、阎学通、张文木、时殷弘、冯绍雷：《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 宋伟：《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刘鸣主编：《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前沿：探索与发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架,但其结构化、系统化程度距离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主流理论范式(学派)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学术界需要结合时代特征,加强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学术体系化建设。一方面,学术界要加强对既有中国学派理论、路径的创新、融合和体系化建设,形成能够吸纳中国国际关系各学派具有共性特征、呼应时代需求的体系化、结构化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学术界也需要构建能够支撑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具有科学性且兼备中国特性的体系化理论(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以中国特色新型国际规范、观念实证研究为着力点,在中国学派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融合与扬弃过程中推进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系统化、结构化和理论化。

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外交话语体系的形成,反映了中国崛起背景下国际观念结构和体系的新变化,它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如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何处理与世界关系等外交理念的系统性阐释,打破了西方理论界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独霸局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政策、实践的指导原则,不仅蕴含和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建国以来外交理念的精髓,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因而具有更强的国际复合视野、时代特征、进程导向和责任意识。面对当前西方国家主导国际关系领域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需要深化等现实境况,中国外交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因此,中国学界必须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客观清醒的认识,要遵循“问题化—方法化—概念化—结构化(系统化)”的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一般性路径,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增强问题意识、创新研究方法、创设研究的核心概念、强化学术体系化,从这四个方面层层递进,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

(责任编辑:李宏)